

从过程论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

□ 李海青 李 航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如何理性认识并有效阐释其优越性始终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问题。当然，这也并非什么新问题，而是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以来一直就存在并且今天依然需要深化认识的一个问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成就辉煌，尤其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毋庸讳言，今天中国在人均方面许多指标尚达不到世界上游，现代化与文明程度在某些领域尚不及发达国家，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发展中还面临相当多的问题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理性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何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方面可以从今天中国发展已经取得的整体成就来予以说明，但更为深刻、更具说服力的，还是一种历史过程论的认知与阐释视角。这种历史过程论的视角不是抽象地从理论逻辑上依据经典著作演绎与论证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不是静态地仅以现实某些发展数据表明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成效，也不是靠批判资本主义本身的某些痼疾，而是用一种过程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过程论的视角首先要明确起点。就起点而言，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而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小生产占优势的传统社会的基础

上，由一个先进而强大的政党领导广大人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它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以发达生产力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形态差别极大。尽管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但生产力水平总体来讲仍然不高，经济社会发展起点仍然较低。这就决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所开辟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与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有差距，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横向比较在很多方面也存在差距甚至较大差距。既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哪呢？

在历史过程论的视域中，作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主要体现在从低的起点上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更公平的发展上，体现在效率与公平切实统一的建设进程中，体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更有效推进上。换言之，体现在以更短的历史进程，用更少的代价，以更合乎人性的方式，以人民满意的评价，在尽可能多的领域或方面取得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用更长的时间方

能取得的成就上。邓小平的名言就体现了这种过程性思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就是说，要用一种生命成长的眼光来分析 and 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优越性并不是先天就毫无疑问、在各个领域确定无疑的，而是在不断的建设、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充分展现的。尽管起点低，但其方向选择正确、道路切合实际、治理更为有效、发展更具活力，或者用比喻性的说法表述，在发展方面的性价比更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差不多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现代化所走的历程，经历了西方几百年所经历的问题，在“时空压缩”的时代背景下不仅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自身现代化的诸多问题与挑战，而且也取得了与发达资本主义相比在诸多方面毫不逊色的成就。

当然，依然存在的问题不能回避，在某些领域的差距也必须正视，但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

国，国情如此复杂，几十年时间保持政治社会的基本稳定，在低的起点上比较顺利地实现转型与发展，成就确实极为辉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就此而言，与发达资本主义在结果层面的横向比较才是正确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

以这样一种历史过程论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低起点情况下建设、改革、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其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进一步生长与增多的过程。这就如同一个生物有机体从

小到大的生命成长过程一样。谈到社会主义因素的进一步生长与增多，似乎是个奇怪而多余的问题，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不就意味着完满的社会主义因素吗？从规范的理想意义上看确实如此。但正如上文反复提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明确强调过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至今，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尤其是党的领导当然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一方面，已有的社会主义因素有一个自身逐步调适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不够格的现实基础决定了在从不够格到逐步够格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当年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因素将会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

实际上，低的历史起点决定了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必然有一个更多新社会因素逐步产生的过程。从大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向更高的阶段迈进，已有的社会主义因素会逐步优化，新的社会主义因素则会愈益增多，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趋势。“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他看成是处在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综合以上，从过程论的视角，以生命成长的眼光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合理地看待今日中国之差距与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低的历史起点之上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展示了自身的生机活力，已经较为有力地证明了自身的优越性，殊为不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展望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在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之中，还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强劲的内生动力，还有更为光辉的使命有待完成，在未来的生命成长过程中，在对难题与挑战的持续破解与应对中，其社会主义本质将会得到更好实现，自身优越性将得以更好体现。

理论研究

人权话语权助力中国话语复兴

适应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抓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所推崇的契机，构筑人权话语权，既是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展示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话语复兴的必要基础。

□ 王 静

继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演讲，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3月23日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所认同，纳入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标志。“大国复兴，话语不能缺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识为中国话语复兴创造了新的契机。“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曾指出，人权、发展、和平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主题。其中，“人权是已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21世纪的今天，人权议题不仅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而且已成为大国之间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因此，话语复兴离不开人权这个主题。适应中国发展为世界强国的需要，抓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所推崇的契机，构筑人权话语权，既是回应国际社会关注，展示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话语复兴的必要基础。

人权话语权以包容互鉴为基本特征。20世纪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常常以人权卫士自居，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妄加贬抑，横加指责。一时间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人权议题无法交流而只能相互指斥、对抗的怪象。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一高屋建瓴的论述将自诩为人权卫士的国家拉下了神坛，重新为世界各国明确了平等的人权话语地位。既然每个国家国情不同、人权发展状况各异，那么，摒弃指责，互相包容，相互借鉴，谋取人权进步，理应成为人权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原则。只要每个国家在结合本国国情特点和发展阶段，走上一条不断发展和提升人权状况的道路上，它就理应被尊重。只有每个国家人权发展进程的多样性被认同，少数国家对人权国际话语体系的垄断才能逐渐被打破。也只有依据上述原则，才能解决偏

见存在的前提，才能解决认知错位问题，才能为国家话语复兴创造主观认同的基础。由此，主动阐明人权基本事实、选择性地驳斥歪曲和攻击、澄清错误认识，也才有可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发展是话语复兴的前提，人权话语权也离不开发展。国家话语复兴，究其实，是国家实力的延伸。没有国家的发展、人权的向好，话语复兴终将流于水中月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权状况的不断提升所凝结的发展优势为话语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国际社会中国别间的复杂利益格局，决定了发展的客观事实并不会必然带来国际社会的完全认同。应当看到，发展是客观实在，认知是对客观世界认识后的主观结果。它是一个逐渐使主客观趋于一致的过程，它需要时间，还需要会说、让别人听得进去，进而公开认同，再进而形成共识。

21世纪的中国话语复兴，离不开“会讲”人权，即用国际范式说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话语复兴产生于我国与其他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之中，它不是自说自话。“会说”，就是要做到换位思考，知己知彼，用国际社会习惯的范式讲述中国，介绍中国人权状况。分析国际社会人权话语范式可以看出，用学术讲人权相较于官方宣传更易润物无声，被听进去；在人权国际学术交流中讲我国人权相较于媒体报道更易获得信服。因而，检省既有宣传方式、内容和途径上的路径依赖，改革单纯以官方为主、以媒体宣传为主、以搞“请进来走出去”活动为主的讲人权现状，学会熟练使用国际范式讲中国故事势在必行。考虑到国际社会受众更易接受学术范式，即以长足学术研究为基础，以扎实科学数据为论据的“中立”学术语言，会说中国人权应当倡导主体多元、方式更多元，更加注重运用学术语言阐释人权发展，更加重视利用人权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为此，应当着力培养有学术积累的研究机

构、学者积极参与相关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用国际范式讲中国故事，不仅要讲出来，还应不停留于为讲而讲，要在讲中明确目标，着重引导。不仅仅介绍中国人权发展状况，还要通过主动设置人权国际交流议题，争取主动，谋取话语权。一方面，需要主动研究国际舆论场的形势，面对他方设置的议题，策略性发声。做到既不回避国际社会关注的人权议题，在直面关注中长于策略性表述，也要注意避免陷入恶意预设的议题。对一些抹黑我国人权状况的国际言论，不作简单的应激性回应，避免因回应反而助推了这些议题的影响力，转而以历史维度、全面的比较视角和更高的姿态获得瞩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人权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尤其是在减贫方面的成就已经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适时扬我所长，主动发声，是夺得先机、占领第一印象，避免陷入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解释局面的重要策略。当前，适逢“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期，应以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议题，在沿线国家和重大国际会展平台展开相关人权交流。从历史对比、文化共生的视角，以鲜活案例为引子，以中华民族对民族文化、对传统民族建筑的保护为议题，开展文化、建筑主题的国际交流活动。从中客观展示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现实，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引导人权话语，并在各国参与我方设置的新议题的交流中，逐渐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人权话语权。

话语复兴是国际交流的产物。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挖掘共情是造就相互倾听心理基础的良策。在国际交流中也莫不如此。在人权国际交流中，如何让交流各方摒弃互斥，坐得下来、听得进去、愿意认同，是赢得人权话语权的必经之路。为此，可以梳理历史和现实事件，挖掘共同的情境、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等议题，疏通国际间共同的情感基础，促成人权领域的平等交流。近年来，极端恐怖组织不

断实施暴力恐怖活动，激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愤慨。针对一些国家对美国在反恐活动中“破坏基本的国际正义”的质疑，我国积极推动反恐国际合作和交流，着力共建大数据合网为一，正在反恐创造的共情氛围下，通过国际交流，无形之中赢得话语权，为话语复兴奠基。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21世纪的中国话语复兴，需要加强人权话语的针对性。话语复兴，赢得话语权是一场以增强国际社会受众认同度为目标的战役，绝不是自说自话。为此，需要在充分调查研究国际社会受众组成、受众心理、受众认知习惯等的基础上，根据国际社会不同受众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建构话语策略。因而，应以精准替代全面撒网，重视话语的影响力和认同度。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即通过研究不同的国际社会成员的认知特点，细分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国家智库、社会学术研究机构和普通社会公众的认知现状、认知习惯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人权话语策略。如针对官方的人权话语策略，应注重运用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的统计数据；针对非政府组织的人权话语策略，应直接参与人民群众个体的直接参与。话语复兴也应当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在自媒体时代，应鼓励用个人讲述生动故事的方式，补充单一的有组织宣传。此外，还应着力发展多种语言的人权话语传播，积极资助能在国外媒体发声的展示人权发展成就的纪录片、摄影等文化作品。

人权以人为本，不可脱离国情。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多、区域差异性大、发展不平衡。这些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在进一步改善人权状况方面还面临着不少挑战，需要假以时日。为此，须久久为功，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博采众长，用发展助力人权不断向好，多策并举赢得人权话语权，最终为中国话语复兴筑基。

专家视点

话语出处：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指出，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

学习札记：何谓“一亩三分地”？原来是1644年清王朝建立之后，因满族原是游牧民族，为及时了解农时、熟悉节令，居住在深宫大院里的皇帝便在惊蛰时节乘龙辇从正阳门到先农坛耕地。当时划出的这一块地叫“演耕田”，每年由皇帝、皇后“亲耕”，昭示普天之下该种五谷杂粮了，并以此显示清朝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这种做法被清朝官员模仿并世代沿袭，后人不得将这种“演耕田”改作它用。因这块地的面积恰好为一亩三分，于是民间推而广之，演绎为个人利益或个人势力范围被称作“一亩三分地”。

贾谊在《过秦论》中曾说，六国“会盟而谋弱秦”“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最终结果却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可惜六国纵有吴起、孙臏、乐毅、廉颇等军师名将，也只能功亏一篑。原因在于，各有怀抱、貌合神离，都只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而成不了大事。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这样。因为国家发展是整体的发展，是各个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协同发展的前提是必须真正做到心“同”力“协”、整合资源，优势互补、互利互惠，而不能各自盘算自己的“小九九”，固守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习近平总书记借喻京津冀合作发展成功模式，强调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摒弃各自“圈地为王”和在自己区域内“小打小闹”的做法，做到抱团发展、协同发展，这既是要求，更是警醒。

从当今世界看，实现区域协同协调发展是大势所趋。从美国波士华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群，到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这些跨地区、跨国界的城市群之所以成为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区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打破了地域壁垒，实现了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物流、人流的通达性。从国内情况看，我们业已形成的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多个城市群，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要不断突破地域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取暖、共同发展。可见，闭门算计没有出路，相互合作才有未来。

现在，一些地方之所以搞这样那样的地方保护主义，一味强调地方利益、当地发展，不愿意与他人联合、不习惯与他地协同；一些地方和地方之间之所以存在各自为政、相互掣肘，甚至出现以邻为壑的情况，说到底还是这些地方官员的官本位思想在作怪，还是“一亩三分地”思维在作怪。总觉得“我的地盘我做主”，何必与别人分享；总担心别人会动了自己的“奶酪”，与他人合作要吃亏，因而在跨地

『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

自觉打破自家

域合作上不积极、不主动、不配合，或者回避具体问题的磋商，玩“拖字诀”等等。这些都是缺乏“全国一盘棋”思想的表现，既不利于地方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区域的协同发展，更不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必须坚决予以克服。

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最根本的是要拓宽视野，树立大局意识，去除官本位思想。“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一个有远见的领导干部，决不能眼睛只盯着自己所管辖的那一片区域，而应该登高望远、胸怀全局。转型期的领导干部，如果看不到区域合作、地缘经济的光明前景和强大后劲，或者看到了却不去积极促成合作，那不能算是合格的。我们不能身体已进入了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20世纪。我们不仅要有大格局，而且要有大胸怀。要树立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思维意识，放下“只重眼前利益”的短浅认识，抛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利益迷思，推倒“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权力心墙，努力推动地方之间、区域之间协同发展，实现互相支持、互相协作、互利共赢。